

二十一世纪以来印尼华人“再华化”现象研究

张小倩

内容提要 21世纪以来,印尼华人群体内部出现了“再华化”的现象。“再华化”的出现与印尼政府对中国政策的转变、中国的和平崛起以及当地华人思想观念变化等现象密不可分。同时“再华化”对中华文化软实力在印尼的影响传播也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笔者通过在印尼实地调研所获得的成果,阐述印尼华人“再华化”的背景、表现,对“再华化”是否存在及其程度和性质进行了讨论,并探索这一现象对传播中华文化软实力的影响。

关键词 21世纪 印尼华人 再华化

日本京都大学东南亚研究所教授施蕴玲(Caroline Hau)指出,2000年以后,在东南亚华人社会出现了一种“再华化”的现象,它是指华人群体过去曾被贬低、被压抑的华人性(Chineseness)的复兴;广义地说,它是指东南亚和其他地区华人持有公开而活跃的族群身份认同,华人在当地社会的接受度变得更高,华人的自信心变得更强。^①此外,庄国土、云昌耀等学者都曾或多或少地指出东南亚华人社会出现的“再华化”现象。

基于苏哈托统治时期,印尼政府禁止华人群体有关族群文化的特征在公开场合出现,华校的关闭、华人社团的转型以及华文教育的缺失等事实,印尼华人的族群文化传承在此期间缺乏系统性和连贯性,华人文化特征几乎在印尼大众视野中“销声匿迹”。目前在东南亚华人社会中的“再华化”现象,在印尼华人身上具有比较明显的表现。

2014年5月至7月,笔者就印尼华人“再华化”问题在爪哇岛进行为期两个月的田野调查,其中包括在万隆、三宝垄、泗水等城市开展的有关“印尼华人文化认同现状”的问卷调查,分别收回有效问卷82份、95份和79份。问卷调查内容包括受访者接受华文教育情况,参与华人社团活动以及华人传统节日情况等,并对个别受访对象进行了深度访谈。笔者希望通过此次调查,探讨印尼华人社会是否出现了“再华化”现象以及它的程度和本质。

一、印尼华人“再华化”的背景

印尼在“97金融海啸”中遭受重创,政府急需重建国家经济;同时印尼的排华和种族歧视政策也遭到了华人及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因此,1998年对中国和华人态度强硬的印尼总统苏哈托下台后,其继任者的对华外交政策及在国内对华人事物的态度都渐趋友好,并开始在官方立场上逐步废除过去歧视华侨华人的法规。例如,在瓦希德任总统期间,废除了1967年的第十四号总统决议,这一决议内容主要是禁止印尼华人在公开场合庆祝华人节日。基于此,他本人及其内阁成员还参

^① Caroline Hau, “Becoming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in Peter J. Katzenstein (ed.), *Sinicization and the Rise of China*,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2, pp. 175 - 206.

加了2000年在雅加达举办的华人新年庆祝活动。同年还将华人信徒众多的孔教纳入了印尼合法宗教之内。在梅加瓦蒂总统任期内,则进一步批准华人新年作为印尼的国家节日。^①华人的政治地位逐渐得到了改善和提升。

从中国的角度来说,自2000年以来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与和平崛起的势头吸引了包括印尼在内的世界各国的关注。至2013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及外汇储备逐年增加并始终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②2010年中国更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的发展无疑将吸引更多海外华人来中国投资。印尼作为东南亚华人最多和华商众多的国家,当然也不例外。在苏哈托下台之后印尼华商建立了自己的组织,这其中至少有4个商业组织是由印尼华人主导或者印尼华人参与度很高的组织,它们分别是:印尼—中国经济、社会与文化合作协会(Association of Indonesia-China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Cooperation)、印尼工商会馆中国委员会(Kadin Indonesia Komite Tiongkok)、印尼工商会馆中国委员会(Indonesian Chamber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China Committee)、印尼中华总商会(Indonesian Chinese Chamber of Commerce)。^③这些商业组织实际上对印尼经济的发展以及印尼与中国的经济联系都有所贡献。例如印尼中华总商会于2001年成立,其主要职责是团结印尼华人企业家,为推动印尼的经济建设贡献力量,强调对内加强互助合作建设繁荣经济,对外加强与世界各国华商的联系,特别是与中国企业家的联系。^④印尼知名华商大企业如三林集团(Salim Group)、芝普特拉集团(Ciputra Group)等也都在中国各地大规模投资。此外,据印尼汇丰银行2007年调查显示,2008年印尼中小企业中有81%的企业表示要扩展业务,值得关注的是51%的中小企业宣称要进入中国市场,改变以往主要以美国市场为对象的发展目标。^⑤这些中小企业中,华商企业占据相当一部分,在与中国的经济合作中起了带头作用。

另外,新移民的加入也是印尼华人社会“再华化”的重要动因。新移民离开祖籍国的时间不久,因此相较于土生华人,前者更倾向于在当地恢复和建构自己熟悉的中华文化,客观上为印尼当地华人重新拾获华人文化增添了助力。根据福建省调查资料,1996年前往印尼的新移民及其子女约30900人,而到2005年,仅在印尼的福州籍新移民即增至51311人。^⑥这些新移民到达印尼后,往往会加入宗亲会或地缘社团,参与其中的活动,以便更好地融入当地生活。新移民在经济文化及社会活动领域为印尼华人社团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印尼华人文化的复苏和发展。

新世纪的印尼华人群体身份认同已然在增强,但是令人忧心的是印尼55岁以下的华人对华人文化及华语的了解和掌握程度远远低于其周边国家水平。据暨南大学一项问卷调查显示,与马来西亚及新加坡相比,印尼的华裔明显对中华文化各方面了解偏少。^⑦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就是在印尼前总统苏哈托统治期间对华侨华人实行的强制同化政策。由于印尼华人的一言一行都遭到当局管制,使印尼华人几乎失去了他们讲华语的能力,传统文化习俗也无法公开表达。但是,通过下文我们可以了解到大部分印尼华人在内心深处对族群文化传承依旧渴望,华语并没有在印尼完全消失。然而由于客观环境的制约,华人语言和文化丢失仍很严重,特别是没有经历过华校教育时期

① Leo Suryadinata, “Chinese Indonesians in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 Some Major Characteristics”, in Leo Suryadinata (ed.), *Ethnic Chinese in Contemporary Indonesia*,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Publications, 2008, p. 9.

② 《全国年度统计公报》载 <http://www.stats.gov.cn/tjsj/tjgb/ndtjgb/> 《中国历年外汇储备》载 <http://www.safe.gov.cn/>.

③ Eddie Lembong, “Indonesian Government Policies and the Ethnic Chinese: Some Recent Developments”, in Leo Suryadinata (ed.), *Ethnic Chinese in Contemporary Indonesia*, p. 54.

④ 《专访印尼中华总商会副秘书长陈立志》载 <http://www.mofcom.gov.cn/aarticle/subject/nbh/subjectc/200510/20051000577928.html>.

⑤ 江振鹏《印度尼西亚民主改革以来华人经济的新发展及其启示》,载《当代中国史研究》2010年第6期,第75页。

⑥ 庄国土《东南亚华侨华人数量的新估算》,载《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2009年第3期。

⑦ 陈奕平主编《和谐与共赢:海外侨胞与中国软实力》,暨南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69页。

的一代。

华语和族群文化方面的缺失又可能会导致经济方面的连锁反应。从商一向是东南亚华人的首选职业。在华商网络的建立过程中,地缘与血缘即地缘社团或同姓社团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大多数成功华商在合作伙伴建立和拓展时需要的媒介多是方言或普通话。显然,这对那些不会讲普通话或方言的华商是极为不利的。

对于华人社团而言,它们需要充实年轻的血液,如果华裔青年对华人社团的活动没有兴趣,那么现有的华人社团就将面临解散的危险。另外,华文媒体和华文教育的存在和发展,也要基于印尼华人对学习和传承华人文化的渴望和需求。因此,笔者认为,从印尼社会发展的趋势与华人族群长远的发展来看,印尼华人的“再华化”是必然也是必要的。华人的族群文化是华人群体确立自身的归属感与认同感的基石,因为印尼华人的特殊社会历史经验表明,虽然与其他国家华人一样,族群之间互相融合是社会环境和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但是现阶段印尼华人族群身份认同感在持续增强。有越来越多的印尼华人认识到,如果抛弃自己的族群文化认同,那么印尼华人就会陷入尴尬的地位——虽是印尼合法居民却没有任何一个民族的归属感。就像其他友族一样,印尼华人族群应该保持自己的身份认同和文化认同,作为印尼社会的一个少数民族,追求自己的权利,履行自己的义务。

总之,“再华化”的出现主要是印尼华人的主观意识驱动,但与印尼社会及政治变迁、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提升都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是多方面作用的结果。

二、印尼华人“再华化”的外部动力和“再华化”的表现

(一) 印尼与中国关系的改善和发展

中国的经济发展以及向世界推动中国文化软实力的举措同样吸引了印尼的目光。印尼与中国在上世纪90年代恢复邦交之后,特别是21世纪以来,双方在各方面的交往更加密切:华人在大陆的投资增多、印尼留学生的增加、印尼在大陆旅游人数的增加以及双方频繁举办各种文化交流联谊会,等等。

1997年东南亚爆发“金融海啸”之后,中国政府一直致力于与东南亚各国建立更进一步的经济联系,如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1999年,时任中国总理朱镕基在东盟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正式提出了这一概念,但是并没能达成一致。一些东盟国家,特别是印尼,并不支持这一提议。然而,到2000年11月举行的第七届东盟高峰会时,尽管印尼并没有公开表示支持,但包括印尼在内的东盟全体成员国接受了这一提议。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于2010年1月1日正式建成。^①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之所以得以顺利建成其中离不开东南亚各国特别是印尼华人企业家的从中调解和帮忙。此后,中印尼双方就达成了一系列的协议和合作计划。双方经贸往来紧密。据印尼中央统计局数据,从1999年开始,至2015年3月印尼对中国出口额逐年增多。^②

在留学生人数方面,以厦门大学为例,自1998年起,尽管来自印尼的留学生比例有所下降,但是从实际人数来看,印尼一直是厦门大学留学生人数最多的国家。由表1可知,印尼来厦留学生这8年来基本呈增长趋势。1998年和1999年可能受印尼国内排华冲突驱使,一部分华人留学生因避难而来;2003年受非典影响,人数有所减少。

①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载 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7-01/15/content_5607479.htm。

② 《印尼对中国出口贸易额》,载 http://www.bps.go.id/all_newtemplate.php。

表1 厦门大学8年留学生招生数据表及印尼历年招生表

年份	招生人数	印尼年度招生人数	百分比
1998	227	99	43.6%
1999	280	133	47.5%
2000	302	61	20.0%
2001	467	72	15.6%
2002	627	124	19.7%
2003	503	79	15.7%
2004	1091	118	10.8%
2005	1055	125	11.8%

资料来源:厦门大学十年印度尼西亚留学生教育研究报告。

在入境旅游方面,下列表格是中国国家旅游局的相关统计数据:

表2 2005年至2014年上半年按照入境目的归类的印尼籍游客人数

年份	总人数/万人	会议	商务	观光休闲	探亲访友	服务员工
2005	37.76	37.24	19.42	10.52	0.52	0.08
2006	43.30	27.40	30.40	0.37	5.92	3.85
2007	47.71	25.29	36.61	0.059	6.09	2.41
2008	42.62	1.98	31.40	0.028	6.95	2.25
2009	46.90	1.83	35.00	0.04	7.18	2.85
2010	57.34	2.43	44.04	0.03	7.69	3.15
2011	60.87	2.52	46.98	0.05	8.17	3.15
2012	62.20	3.33	46.22	0.06	8.86	3.72
2013	60.53	2.87	42.34	0.11	10.86	4.36
2014(1—6月)	27.29	1.07	18.02	0.12	5.44	2.63

资料来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旅游网站(<http://www.cnta.gov.cn/html/rjy/index.html>)所提供2005年至2014年6月外国旅客来华入境游人数资料整理所得。

从上表可以看出2005年到2014年印尼籍游客入境总人数总体呈波动上升态势,虽然印尼籍游客并非都是华人,但是通过相关客观事实可以推断,其中华人访客应该不在少数;从上表也可以看出2005年之后的印尼籍游客中探亲访友人数锐减,而观光休闲的人数却锐增,但其实也不应排除在观光休闲的印尼籍游客中仍有一部分有探亲访友的目的。

总的来说,在新世纪到来之后,印尼与中国交往更加密切,从而带动了印尼华人与祖籍国的交往,部分华人扭转了对祖籍国的刻板印象,也为印尼华人重新确认和提升身份认同感提供了动力和环境。

(二) 新加坡、马来西亚华人文化认同现状对印尼华人“再华化”的推动

新加坡是人口主体为华人的国家,马来西亚的华人族群在国家人口中占据的比例也不容小觑。印尼与这两个国家比邻而居,随着三方各种交往密切且频繁,新加坡与马来西亚的华人文化认同积极性对印尼华人显然会产生了正面的影响。单从华语教育方面来说,在马来西亚,从华小到中文大学,各级学校均显现出浓厚的中华文化氛围。因为,这些学校的学生和教师绝大多数是华裔,华语因而成为学校的主要行政用语和交际用语。以人均占有量计算,马来西亚华人拥有的华文报刊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够与之相比。^①新加坡方面,虽然英语是其官方语言,但是自从1979年新加坡推行“讲华语运动”以来,新加坡华人的文化身份认同提升,华语逐渐在其日常交流中占据重要地位,中华文化也因此得以传承和延续。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曾说过:“新加坡华人,由于情感上和文化

^① (马)陈志明著,李远龙译《马来西亚华人的认同》,载《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1998年第4期。

上的需要,将会而且必须继续使用自己的语言来交谈、阅读和书写。这是认清自己民族性和自尊的基本需要。……如果我们放弃双语政策,我们必须准备付出巨大的代价,使自己沦落为一个丧失自身文化特性的民族……”^①在语言学者陈松岑的调查中,新加坡有超过1/3的受访者认为华语主要是实用的、沟通不同方言群体的一种交际工具;另有将近1/3的人,认为华语主要是本民族的表征;还有约1/5的人,认为华语主要是继承华族传统文化的工具。从纯粹功利的角度,把华语当成发财或有利于旅游的工具的人,不过1/10。^②可见在将华语作为团结华族的工具、继承华族的文化、作为华族的表征等主要功能上,新加坡华人的认识是基本一致的。

由于苏哈托时期的排华以及与中国关系的恶化,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成为家庭条件允许的印尼华人家庭子女留学的首选,这无疑对他们的华人文化和语言习得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在笔者于爪哇岛进行调研期间,有不少被调查者特别是处于大学阶段的年轻华裔告知笔者,他们学习华语是因为在前往新加坡或马来西亚旅游时,在机场或其他地方用马来语或英语向当地华人问路时,总有人会惊讶地问“你是华人为什么不会讲华语?”这一现象无疑刺激了他们的华人文化身份认同感,特别是没有接受过华语教育,对华人文化身份认同较淡薄的年轻人。

(三) 印尼华人“再华化”的表现

华文教育、华人社团一向是华人在居住国传播族群文化的主要途径,但是在苏哈托统治时期,这两方面都因受到印尼政府的压迫而被迫关闭或转型。华人传统节日活动作为华人文化的一个重要表现特征,在此期间也被禁止公开举行或庆祝。直到苏哈托下台后,随着华人的努力和印尼政府对华人各项权益的开始重视,形势才发生了转变。在印尼当代历史上,华人第一次享受到了最大程度的自由。不论在政策法规方面还是在文化方面都有了很大程度的改善。印尼华人正在逐步争取自己的族群权利,而且已初见成效。比如,印尼政府在官方立场取消对华人带有歧视意义的称呼“orang cina”,而代之以“orang tionghoa”(笔者按:此为“中华”一词的闽南语发音)。官方立场上,政府已经不再强调同化政策,对华人的各种文化活动也逐渐放宽。印尼政府政策的改变对华人文化的复兴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印尼华人群体也利用这一条件开始了文化复兴的过程。

1. 华文教育的兴盛——“华语热”与身份认同。在印尼政治环境开放后,老一辈华人因为受过“无书可读”之苦,一直致力于华文教育和中华传统文化的弘扬,特别是华文教育。他们希望还未接受过华文教育的下一代能够重新学习自己的母语,以增强族群文化认同感。他们认为,要使族群文化不断根,语言的传承至关重要。20世纪60年代以前受过华校教育的一代始终保有对华语和华族文化的热情,尽管在强迫同化时期忍辱负重,但是老一辈华人在印尼政治环境开放后,勇于公开表明自己的华人身份,扛起了“再华化”运动的大旗。他们开始在公共场合讲华语,在店铺贴上有传统中华文化象征意义的“福”字,或挂上同时有印尼语和中文的招牌并在餐馆附上中文菜单;筹资开办大量中文补习班、三语学校,等等。

大多数三语学校都是在2000年后建立的,虽不受教育部管辖,但是由于越来越多的人学习普通话,教育部长也在中国政府和印尼华人社团之间协调,希望将普通话教育引进公立学校。直到2007年,雅加达至少有50所三语学校。^③许多失去华语能力的印尼华人特别是在1965年华校关闭后才小学或者初中毕业的老一辈华人希望让自己的子女或孙辈重新开始学华语,三语学校的创办者基本上都是当地华人基金会领袖。除了致力于传承华语和中华文化,同时也为了促进

① 李光耀《世界华文教学研讨会开幕词》,载《世界华文教学研讨会论文集》,新加坡华文研究会编印,1990年。

② 陈松岑《新加坡华人的语言态度及其对语言能力和语言使用的影响》,载《语言教学与研究》,1999年第1期,第85—86页。

③ Aimee Dawis, “Chinese Education in Indonesia: Developments in the Post-1998 Era”, in Leo Suryadinata (ed.), *Ethnic Chinese in Contemporary Indonesia*, pp. 81-84.

华人与友族的语言和文化交流,他们积极投入于华语教育。比如泗水的小太阳三语学校、马吉朗的培德国民三语学校、三宝垄的南洋三语国民学校,等等。除了三语学校等初级教育基地之外,各大高校也相继成立中文系,不仅吸引华族学生也吸引了原住民学生。由于当地华人甚至原住民的需求和帮助,200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汉办应印尼政府要求,派遣20名汉语教师前往印尼援助汉语教学。在得到印尼政府的首肯后,印尼的第一所孔子学院也于2007年挂牌成立,截止2010年共成立了六所孔子学院。^①

为了探查现今印尼出现的“华语热”现象是否与华人族群的身份认同有直接关系,或者只是将华语作为一种谋生手段,笔者在问卷中设计了“是否想学华语及其学习目的”一题,并对调查结果做了如下统计:

表3 爪哇岛部分城市华人学习中文及其目的情况表(单位:人)

地区(市)/份数	对保持华人身份重要	掌握多语言、经商、工作等需求	爱好	不想学	无作答
万隆/82	35	59	2	6	6
三宝垄/95	43	57	2	8	2
泗水/79	28	60	14	1	7

资料来源:笔者于2014年5月—6月在爪哇岛所搜集问卷资料。

透过这个结果,我们还不能立即断定想要学习或者已经在学习华语的受调查者中,学习华语目的的功利性大于追求自己的华人身份认同,这一点在本问卷主观题“华人是否应该保持文化传统,要保持哪些方面”一题中,也可以得到证实。例如万隆的既得问卷中有30人明确回答“语言”(笔者按:虽然答案中也有明确回答普通话或方言者,但是回答“语言”者占绝大多数,因此将其他两个答案也归纳为语言)应作为华人需要保持的文化遗产,值得注意的是原来并没有选择“学习华语对华人身份认同重要”的受访者中也有18人将“语言”作为华人必须保存的文化传统之一,甚至是唯一。泗水方面,只有不到40%的华人认为学习华语对华人身份认同很重要。但是同样在“华人是否应该保持文化传统,要保持哪些方面”一题中,上述选择偏向现实利益选项的60人中有15人回答了“华语”,这就证明实际上在受访的79人中有43人即过半数的人认同华语对保持华人身份的重要性。因此,实际上华语作为他们的母语对相当一部分华人来说绝不仅是为了现实利益,已经有超过半数甚至更多的受访者认为学习华语对保持自己华人身份认同是很重要的。

此外,2000年以后,随着华文教育的兴盛,华文媒体也开始了重建的过程。例如2000年11月,用印尼语、英语和华语进行播音的“地铁电视台”开播,华人更容易收听、收看来自中国原汁原味的广播电视节目。2001年4月,印尼万隆市华裔陈如镛先生在华社一些人士的支持下成立了“万隆美声广播电台”,这个电台是印尼首家一天18个小时用华语播出节目的电台。^②电台等华语媒介的出现,有别于报刊等传统华语媒体,在繁忙紧凑的日常生活中,可能比传统媒体更受年轻人欢迎,从而增强华人文化如传统文化、音乐等在华人群体甚至主流社会的吸引力。

2. 华人社团推动华语教育,鼓励年轻华裔继承族群文化。印尼华人社团作为当地华人的重要组织,历史上始终发挥着它独有的作用,但在苏哈托任期三十余年内几乎被迫暂停除丧葬外的所有活动。苏哈托之后,印尼的华人社团再次萌发了活力,他们积极组织和参与能加深中印(尼)了解和联系的文化、经济活动,促进了双方的了解和合作。在国内,华人社团也积极开展各方面活动,促进华人群体的文化教育和发展。

其中,支持印尼国内的华文教育是华人社团工作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2001年印尼教育部决

^① 姜冬梅《印尼孔子学院的建设现状分析与解决方案》,载《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11年第3期。

^② 陈奕平主编《和谐与共赢:海外侨胞与中国软实力》,第83—85页。

定将华语纳入国民教育体系,作为中学外语选修课程之一后,^①为了抓住这一机会建立学校、聘请华语教师,各个华人社团开始筹资。一时之间,由华人社团直接兴办或支持的华文学校相继出现,并推动在印尼境内逐渐建立了从幼稚园、小学、中学到大学的完整的汉语教育体系。除了对汉语教育的推动,不少地方性社团内也积极开展祖籍方言的教育,如雅加达晋江同乡会、雅加达客属公会、三宝垄福清公会、泗水惠潮嘉会馆等社团,都定期开展对社团成员包括年轻华裔的方言教育工作。这些社团开展方言教育的目的是希望能推动更多的华裔能够接受并学习祖先文化,不要忘本。

其次,鼓励华裔青年传承华人文化也是社团的另一项重要任务。笔者于2014年6月份前往印尼期间,采访了部分社团领袖,希望了解目前社团内部年轻人参与文化及社会活动的现况,采访对象包括万隆的福清公会、万隆闽南公会、三宝垄闽南公会、三宝垄福清公会、三宝垄大觉寺基金会、泗水中印文化交流协会、泗水惠潮嘉会馆、泗水黄氏宗亲会、泗水华裔联谊会、雅加达晋江同乡会、雅加达客属总会等。对族群关系及华人传统文化的担忧,使这些社团和组织都持续朝着恢复华人文化,促进印尼各族群文化交流及开展慈善和体育运动等方向前进。老一辈华人也在积极培养下一代接班人,推动更多年轻印尼华裔加入、参与继而组织社团活动。如万隆福清公会、泗水黄氏宗亲会、雅加达客属公会等都设有青年部,在访谈过程中,它们的负责人告诉笔者,他们现在的活动尽量朝着年轻人感兴趣的例如传统音乐、舞蹈及与祖籍国/地的文化交流等方向发展,希望能吸引更多的华裔青年参与活动。而这一努力也获得了一定的成效,例如三宝垄的大觉寺基金会、泗水的惠潮嘉会馆等华人社团,都吸纳了不少年轻华裔进入社团参与组织工作。

3. 华人对传统节日的传承及其身份认同的发展。印尼华人“再华化”除了表现在华文教育、华文媒体和华文社团等的实际作为之外,还表现在华人的文化和身份认同方面。在苏哈托统治时期,印尼华人绝大多数完成了从“落叶归根”到“落地生根”的转变过程,加入了当地国籍。但是大部分华人仍自觉传承华人文化。据笔者在2014年5—6月份在印尼搜集的问卷(例如上文对“华语学习及其目的性”的分析结果),以及保留华人的传统节日方面的问题结果也可证明这一结论。

表4 万隆市华人庆祝传统节日情况表

	有过这节	家庭	家族	家庭参会华社或寺庙活动
新年	91%	41%	61%	12%
清明	55%	50%	55%	21%
端午	37%	45%	43%	16%
七月半	16%	29%	53%	29%
中秋	26%	43%	48%	24%
元宵	40%	39%	63%	18%

注:新年75人,清明44人,端午31人,七月半13人,中秋21人,元宵33人。

表5 印尼三宝垄华人庆祝传统节日情况表

	有过这节	家庭	家族	家庭参会华社或寺庙活动
新年	98%	40%	62%	29%
清明	76%	38%	61%	33%
端午	44%	40%	60%	43%
七月半	38%	44%	50%	36%
中秋	49%	36%	53%	45%
元宵	60%	39%	53%	40%

注:新年93人,清明72人,端午42人,七月半36人,中秋47人,元宵57人。

① 《国际日报》雅加达 2004年11月14日。

表6 印尼泗水华人庆祝传统节日情况表

	有过这节	家庭	家族	家庭参会华社或寺庙活动
新年	91%	42%	68%	14%
清明	68%	44%	69%	19%
端午	49%	46%	62%	35%
七月半	33%	46%	62%	35%
中秋	52%	41%	76%	24%
元宵	54%	40%	72%	19%

注:新年72人,清明54人,端午39人,七月半26人,中秋41人,元宵43人。

虽然苏哈托专制统治时期对印尼华人的文化习俗包括节庆采取高压政策,不能公开庆祝,但是从表4到表6的显示结果,可以发现,大部分华人至少仍保持过春节团圆的习俗,以及对祖先的尊重;并且与以小家庭为单位比较起来,大部分的华人仍旧更喜欢大家族聚在一起联络感情共同庆祝,特别是春节及清明这种传统上比较重视团圆及伦理意识的节日。印尼华人仍然顽强地保持了庆祝华人传统节日的习惯,这也表明了印尼华人群体具有较强烈的华人意识和华人文化认同。不过苏哈托的高压政策也部分改变了华人的某些传统。例如,在其统治期间,华人社团和寺庙的职能发生了转变,只保留丧葬功能,而由于华校的关闭,处于求学阶段的华人子弟更多进入天主教和基督教学校求学,因此印尼华人参与华社或寺庙组织的公开节庆活动的规模已经远远不如以前。

综上所述,21世纪以来印尼华人的“再华化”趋势仍是明显的。在2000年的全国人口普查中,仅有240万,即全国总人口的1.2%,承认自己的族群身份为华人,而到了2010年,这一比重却增加至3.7%,即880万人承认自己为华人。^①可见印尼华人的身份认同在印尼政治环境开放后由于老一辈的推动、自身的需求、族群文化复兴的要求以及新政府实行的多元民族、多元文化政策而越发明朗化。

三、印尼华人“再华化”的讨论

印尼华人社会文化复兴现象的出现,引起了学术界关于这一文化复兴现象是否为“再华化”以及“再华化”是否等同于“再中国化”的讨论。总体看来目前学术界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一) 认为印尼华人社会不存在“再华化”

北京大学学者周南京指出,印尼在20世纪初出现过“再中国化”现象,但现在没有。周南京先生认为目前在华人社会中开始“热”起来的华文学习,主要是把华文作为一门外国语文来学习,加强交际能力和谋生手段,许多原住民也热衷于学习华文。^②笔者赞同20世纪初的“再华化”主要是“再中国化”,也赞同现在的印尼华人没有“再中国化”,而是“再华化”。就本文不完全的分析结果看来,目前印尼华人社会的“华文热”除了把华文当作外国语文学习外,其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认为华文对保持华人身份认同很重要。

印尼华人学者廖建裕针对印尼华人姓名的意义与其华人认同的关系,提出他对印尼华人“再华化”的看法。他指出1999年10月瓦希德总统推行亲华人政策,准许华人可恢复使用华人姓名,但却少有华人去恢复华人姓名。在新秩序时期,改用印尼姓名与国家认同及效忠问题相连接,许多华人在半被迫的情形下改用印尼姓名,如今没改回华人姓名,是因为土生华人早已以印尼为认同标

^① Zakir Hussain, “Chinese Indonesians Come Full Circle”, *Jakarta Post*, June 8, 2012, <http://www.thejakartapost.com/news/2012/06/08/chinese-indonesians-come-full-circle.html>.

^② 周南京《周南京有话说——华侨华人研究辑录》,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有限公司2006年,第26—30页。

杆,采用印尼姓名就是对印尼的一种认同,在经新秩序长达三十多年的统治,新客华人(即中国新移民)及其后裔也已“土生华人化”甚至已“印尼化”。^①

但就笔者不完全的调查结果所得,高达82.8%的受访对象有华语姓名(包括普通话或方言),并且大部分由长辈取名。笔者认为这些华人没有主动去恢复华语姓名,并非因为他们已经完全“印尼化”,主要原因在于华语姓名在日常生活的使用意义不大。但是华语姓名特别是姓氏对华人家族有特殊象征意义,而且华语姓名在华人群体的互相联系和交往方面占据重要地位,因此得以保存。

(二) 认为目前印尼华人社会确实存在“再华化”现象

印尼华人学者云昌耀指出,印尼华人以21世纪以来华文教育和文化认同复兴为出发点,形成了“新华人性”。他认为华人利用印尼现在的民主氛围,借由恢复印尼华人文化、媒体、宗教及语言教育,来解放长久受压抑的认同与文化遗产。但是他同时也质疑这种“再华化”的本质是否仍是一种“守旧”并未跟上时代的脚步。^②

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教授庄国土针对“华文热”现象指出,由于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日增而语言为文化的主要载体,华文热将持续加温。中华文化在东南亚地位的提升,甚至成为东南亚华人“再华化”的因素之一,但他清楚指出,“再华化”并非“再中国化”。他认为东南亚华人对中国经济和文化兴趣的增长,不能视为“再中国化”的表现。这一兴趣的增长在现实功利和心理上,对华人族群认同及华人意识的保持会起推动作用,强化其“华人意识”,即使有“再华化”的现象发生,也与以往的“中国认同”不同,“再华化”并不影响东南亚华人对当地的认同。^③庄国土先生明确指出,20世纪末21世纪初的印尼政府在经济现实考虑下对华文报纸的解禁及允许华文补习机构的设立与运转,似乎已多少意识到华族学习或保留其族群文化不会与其政治上对国家的效忠相冲突。

(三) 对印尼华人“再华化”的动机产生怀疑

看到印尼华人从后苏哈托时期开始重新燃起的“华文热”以及复兴华人文化的热情,极个别学者认为这是印尼华人“再中国化”的表现,其中以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名誉研究员薛鸿华的观点最为突出,引起学界争议。争论的焦点主要是其文章中的印尼华人“再中国化”观点。薛鸿华特别强调:印尼当地华文报纸用大量篇幅报道、宣扬、颂扬和鼓励华人学会华文,大办华文学校甚至唱中国歌,跳中国舞是非常危险的,是在搞“中国化”或“再华化”。^④很显然,薛鸿华先生不仅将“中国化”与“再华化”混为一谈,也错误评价了艺术、文化交流的意义。“音乐无国界”这句话虽是老生常谈,但用来批驳“唱中国歌,跳中国舞”是搞“中国化”的观点却再适合不过。进一步说,二战结束后的几十年内,东南亚华人几乎都已经同化于当地,即便留有中华文化的特征,但是这种特征与其公民属性并没有矛盾和冲突。华人对中华历史和文化的认同,有别于对中国的认同。

(四) 笔者对印尼华人“再华化”的展望

基于笔者的调研结果,本文认为21世纪以来,印尼华人社会确实出现了“再华化”的趋势。这一现象的本质就是:在苏哈托时期,受族群和文化迫害所苦的老一辈华人所推动的族群语言和文化复兴运动,年轻华裔受到老一辈的文化热情以及中国经济、文化和平崛起的正面影响,也参与其中,但是其热情不如老一辈华人。

① 廖建裕《现阶段的印尼华人族群》,新加坡: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2002年。

② (澳)云昌耀著、中国台湾“国家教育研究院”主译《当代印尼华人的认同》,“国家研究院”与群学出版有限公司,2012年,第178—179页。

③ 庄国土《台湾对东南亚的投资和东南亚华文教育的振兴》载古鸿廷等编《台湾社会与文化》,稻香出版社,2005年,第93—112页。

④ 薛鸿华《2003年印尼华人又站在十字路口》,载《国际日报·大众论坛》,2003年5月3日;薛鸿华《2003年印尼华人又站在十字路口(再续)》,载《国际日报·印华论坛》,2003年8月14日。

“再华化”的出现引起了部分人士关于“再华化”与“再中国化”之间关系的混淆。为了印尼华人的切身合法利益,也为了印尼社会的和谐发展。印尼华人有必要进一步融入当地社会,对印尼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进步贡献自己的力量。尽管许多印尼华人特别是老一辈华人曾在政治上受过创伤,但华人政治团体和各种非政府组织的成立,使得华人族群较能融入印尼政治生活的各个层面中。印尼华人想要消除“对政治漠不关心”及“经济动物”的华人刻板印象,积极参与政治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可喜的是有越来越多的华人正在这样做,也颇有成效。在2014年的总统选举中,客家华人钟万学成为雅加达新一届省长,这是自苏哈托以来在印尼政治历史上的重大突破,我们也期待钟万学的政治活跃能够更大程度地消除族群偏见并鼓励更多的印尼华人将就业目光从传统经济领域转移到更宽广的方向,全方位参与到印尼民主国家的建设过程中去。

虽然面临青黄不接的困境,但是印尼华人社团作为团结当地华人的重要组织,也一直在为印尼华人“再华化”而努力。另外,著名华人企业家和政治家通常直接参加华人社团举办的国际性联谊活动,^①这在无形中增强了有关社团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有助于吸引华裔青年参与社团事务,从而培养他们对华人族群及其文化的认同感。中国地方政府或组织也经常和印尼各地华人社团合作举办各种演出、展览或学术研讨会,如福建泉州木偶戏团演出或福建学研讨会、每年春节大陆歌舞剧团组织前往印尼进行表演等等。这些活动都有助于加强海外华人对其祖籍地的认识 and 了解,也有利于这些地方文化特色向全球传播。

基于印尼华人“再华化”的事实,为了促进印尼华人的文化身份认同和团结,以及进一步传承华人文化,印尼华人有必要着重传播使居住国主流社会甚至国际社会更能产生共鸣的文化特质。例如2007年11月20—23日,在雅加达举行的第四届国际儒学研讨会,议题主要是重新发现孔教的价值以加强世界的和平与和谐。这就完全符合目前各国追求和平及和谐发展的国际大背景,这场会议也吸引了印尼政府的注意力,印尼宗教部长巴斯尼(Muhammad M. Basyuni)出席会议,倡导全球团结和合作、普世价值观,孔教的价值被再次提及。^②这场会议的成功举办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了孔子学院和中华文化软实力在海外的影响和拓展。

无论如何,印尼华人社会所出现的“再华化”现象在无形中推动着中华文化软实力的传播,同时吸引了印尼其他族群对中华文化的兴趣和参与,有利于推动印尼族群之间的融合、印尼民主国家建设的发展以及中国和印尼双方的进一步了解和交往。

Abstract “Resinicization”, closely related to the changing policies by the Indonesia government towards China, China’s peaceful ris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Indonesians thoughts, appeared in the community of Chinese Indonesians since the 21st century. It has played a key role in the construction and spreading of the soft power of Chinese culture in Indonesia. Based on the field work in Indonesia, this paper elaborates the backgrounds and representations of “Resinicization” with profound reflection and investigates the impacts of “resinicization” in Indonesia on spreading of the soft power of Chinese culture.

(张小倩, 博士研究生, 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 厦门 361000)

(责任编辑: 罗 薇)

① 陈奕平主编《和谐与共赢: 海外侨胞与中国软实力》,第26页。

② Susy Ong, “Ethnic Chinese Religions: Some Recent Developments”, in Leo Suryadinata (ed.), *Ethnic Chinese in Contemporary Indonesia*, p. 110.